

抗战文艺研究

KANG ZHAN

WENYI YANJIU



3
1988

5.6

责任编辑：陈文渊

封面设计：田野

抗战文艺研究 1988.3
KANGZHAN WENYI YANJIU

《抗战文艺研究》编委会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百花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69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册

ISBN7-80524-184-8/J·10

定价：1.90元

目 录

作 家 作 品 评 论

- 《财主底儿女们》与现代知识者的精神
流浪.....夏锦乾 (1)
- 抗战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内迁的历史写照
——论茅盾《锻炼》对抗战时期工人和资本家
关系的艺术处理
.....吴承诚 (20)
- 国统区抗战时期的小说 (1938—1941年)
.....文天行 (34)
- 批判意识：丁玲四十年代的小说意蕴...李晓峰 (60)
- 艾芜和他的《江上行》谈片.....秦 川 (68)
- 马华抗战小说中的情感.....黄奕谋 (81)
- 论夏衍抗战时期戏剧的美学特质赵康太 (86)
- 阿英史剧论徐天健 (97)
- 抗战初期国统区通俗文艺创作潮 (续)
.....史 彦 (114)
- 美的宫殿
陆蠡散文面面观..... 蔡庆生 (143)

文艺运动

- 关于抗战文艺运动的统一战线问题 ... 苏光文 (151)
抗战时期昆明的戏曲评论 毛祥麟 (163)
抗战词话四则 梁溪生 (176)

作家与抗战文艺

- 抗战期间老舍致郁达夫的一封信 天 逸 (180)
何其芳在莱阳 乔彩娥 (183)
关于茅盾、艾青抗战文艺活动若干史
实的补正 李建平 (189)

译 文

- 从王秋萤的作品看东北沦陷期的抗日
文学 [日本] 冈田英树作 莫枷译 (195)

《财主底儿女们》与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流浪

夏锦乾

一

综观路翎的小说，流浪题材占着突出的位置。这已为人们所注意，但人们还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一点，即流浪题材包含了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两方面，并且这两者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直接体现了路翎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审美精神。生活的流浪包括象《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等一批中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大批下层的劳动者在现代社会里失去土地的依凭，被逐出家园，为着生存而四处求食，饥饿的恐惧和生存的忧虑，成为日夜纠缠他们的情结。精神的流浪最集中地表现在长篇《财主底儿女们》中。一群现代知识者有着超过正常人的物质享受，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他们失去了精神的“土地”，被逐出了精神的家园，无所归属。他们也有一个情结，这就是对传统的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情结，他们需要寻找，寻找方向、道路、寻找归属、依凭，寻找自我价值。如果说，生活的流浪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并不是现代社会独特的产物，那么精神的流浪绝对是现代社会的特殊产物，它是现代意识催化下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者在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中，不管是寄身魏阙还是隐匿江湖，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都把封建的文化传统作为自己

的精神支柱。但是从鸦片战争以降，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尼采在西方宣告：上帝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宣告：传统死了！连同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必然一起崩溃。这无非从根本上轰毁了现代知识者从传统中继承来的那座精神支柱和由它支撑着的精神王国。尤为重要的是，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历史已经把这群知识者置身于急剧的社会变动之中。在历史急遽的步伐中，他们想要彷徨，却不能彷徨，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却又必须作出选择，——他们永远不能回到已经失去的精神故园了！就这样，抱负着兴奋、焦躁、骚动、渴望，他们匆匆地踏上了流浪的征途。从客观上说，精神流浪就是一个从否定到肯定，从丧失到重建的过程。因此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颤动在《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中的，正是这种追求所带来的痛苦和欢乐。如果把那种情欲的痛苦看作是现代意识刺激下的精神蠕动的話，那么，即使象小说中的蒋蔚祖这个封建家庭最温驯的子民，他尝到的也无不是一种追求的痛苦和迷惘。仅仅是因为心灵的狭小、意志的脆弱和对传统的无限眷恋，他无法为现代意识和传统精神赤裸裸的搏战提供更广阔的战场。而那个“举起他的整个生命在呼唤着”①的蒋纯祖，却是以“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来证明他的追求的。可以说，小说中从蒋蔚祖的朦胧迷糊到蒋少祖的醒悟到蒋纯祖的奋起突进构成三个不同的追求层次和三级不同的精神阶梯，由他们所连成的现代知识者的道路，分明是一条流浪者之路。从中可以看到现代意识步履维艰地向前掘进、现代知识者精神追求的基本趋向和逐渐明晰的精神目标。

可以说，生活的流浪和精神流浪这两方面在路翎的小说中都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它们构成了路翎小说创作的两翼。流浪所充满的动荡感、自由感，流浪中的寻找所展示的理想的光明感，对路翎那骚动的天性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他正是在尚“动”的流

浪精神与主“静”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冲突中寻找审美快感。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生活的流浪与精神的流浪并不是一回事。路翎当时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把两者看作是一个前后的序列。他在《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中借着蒋纯祖的思考认为：“一个兵士出征，一个农民离开故乡，一个工人在工厂与工厂之间辗转，在集体的生活里，得到了关于自己命运的自觉，这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复杂的精神和物质的”“巨大的运动”，而这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们”的精神世界里。这也可以说，从生活流浪到精神流浪是现代中国人觉醒的必然过程，而且前者直接启示着后者。因此，在“生活流浪”中路翎努力寻找着“人民的原始能力和个性的积极的解放”，②这是一种奔涌着底层劳动者血脉的蛮勇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发展与升华就表现在“精神流浪”中路翎所寻找到的那种主宰着“自我扩张”的“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路翎认为这是民族解放和新生“必得的精神和勇气”。于是，这一时期的路翎的整个创作就统一在对“流浪”的深刻理解之中。

二

精神流浪是一个过程，虽然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这一过程有长有短，但是，它们都无不表现着精神主体的种种复杂的精神现象。而时代的特点，纠结着流浪者精神主体的种种复杂的精神现象。《财主底儿女们》的突出成就就是把这一过程作为知识者的现代道路作了清晰的揭示和深刻的反思，达到时代的深度。可以说，在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很少有谁能达到这一点。下面首先对小说中揭示的这条道路作一分析。

1. “出走”是流浪的开始。

现代知识者大多是从反抗旧家庭开始的。而离家出走是他们

反抗旧家庭的最重要最强烈的行动。在时代的年轻人心中，再没有谁能比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更具魅力。但是，由于封建力量的顽强，“出走”就必然地要承担社会加诸于他们的伦理、道德的精神重负，要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他们只有在对传统精神的绝对否定和猛烈抨击中，才能确立这种个人的自由行为。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知识者身上，“出走”第一次表现为现代意识的一次痛苦的分娩。从深宅大院走向十字街头，从养尊处优的地位走向下层民众中去，他们既抛弃了过去的依傍又寻找着未来的归宿，这些“温良敦厚”的世家子弟就成为现代第一批精神流浪者。

如果说五四时代的“出走”主题主要是把出走当作是反抗旧家庭、获取个人幸福的主要形式，因而仅仅注重在“出走”的本身，来不及思考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那么三、四十年代，即小说中这群财主的儿女们生活的时代，出走就具有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心理。由于旧家庭的根基在民族战争的烽火中愈益濒临崩溃，旧家庭对青年们的伦理束缚和道德束缚已经不是出走所面对的主要障碍，正如小说中的蒋少祖所说的，“我们的家庭已经没有整个，……这就是现代中国社会。”因此，青年们的出走，用不着背负前代人那么多道德和伦理的痛苦，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出走”往往还给他们带来某种光荣。蒋少祖就惊讶于跟父亲的决裂会给他“带来那么多的东西”：“姊妹们温柔的关切”，“大量的金钱”，“光荣的名誉”。小说中的王桂英及比她更年轻的一代，蒋纯祖、陆明栋、傅钟芳等也都很容易地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因此，出走者的痛苦这时已超越了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反抗传统精神的意义，而赋予了主体的独立在更高层次上与传统精神对立——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彻底叛逆——的内容。蒋少祖的出走，就是因为受了“新的思想的熏陶”，“要从内心做一个自由的人”；王桂英在她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带着巨

大的精神创伤，面对冷漠无情的环境时，过去那种朦胧的烦恼、苦闷才突然升华为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彻底的叛逆精神，喊出了“我看不起你的卑鄙龌龊的家庭！”“我有自由！”掉头走向社会。即使象金素痕这样一个充满着魔性的女人，虽然她从未摆脱过旧式家庭，而且还以她的全部天才来实现她的旧家族的“和平图画”，但在她的猛烈的情欲中却有着现代意识的蠢动。在蒋家人眼里，她早已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头脑”，并且成为毁灭“蒋家王朝”的一股可怕的力量。这个时代，出走不再是幸福的象征和归宿，而是痛苦的开始。出走把这些缺乏经验的青年，彻底地暴露在一个崭新的、完全陌生的、充满着激烈斗争和诱惑的世界上。只有这时，他们才不得不认真思考鲁迅在五四时代提出来的“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哪里去？怎么办？成为这一代流浪者的痛苦情结。只有“寻找”才能摆脱这一情结。由于这一情结深刻地联系着主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不仅是寻找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寻找的整个过程都激动着每一流浪者，使他们体验到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王桂英对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说，“一切都离开了我们了！亲爱的儿啊！你的母亲就要离开，她将从此离开她少年时代的世界，到那样的远方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开始她的凄凉的漂泊”。蒋纯祖说：“我望着不可见的远方，前面是升起来的太阳，我什么都不带，一切都不愿意，我就出发了。”

于是流浪开始了！由此，中国现代知识者真正开始了对一个时代的追求，在对象的沉重中，体验自我生命的价值和力量，在黑暗沉重的环境中，追求光明和自由。

2. “寻找”是流浪的主要内容。

历史为现代知识者提供了如此的机会，流浪仿佛拥有了一切自由：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决定自己了。也许王桂英只身来到上海，蒋纯祖抛开了哥哥姐姐们独自向战争前方奔去的第一瞬间，

便体验到这种自由的激动。但是本质上他们都并不自由，他们面临着对自己抉择的更严峻的问题。我是谁？我该怎么办？我向哪里去？小说充满着这种理性的思索，涌动着困惑、胧朦、焦躁的情绪。蒋纯祖问自己，“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生存？”“我将怎样过活，怎样死去？”蒋少祖问自己：“人生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金素痕则大声地责问自己：“我是人吗？”而这一切又归结为蒋少祖、汪卓伦所说的他们只是要在中国“寻找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历史并没有提供给他们。面对延伸到脚下的各种各样的道路，对呈现在眼前的各种各样闪烁不定的诱惑，并且由此引起的自身心灵深处的情感和理智的激烈冲突的抉择，他们都表现出时代的犹豫。“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③因此“寻找”首先是以“知”——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认识为基础的。这使“寻找”必然地带着客观性和历史现实性。而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必然要求主体与客体的一致，个人道路的寻找与整个社会、民族的道路的寻找融为一体。然而，对于现代知识者来说，这似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悲剧命运决定了。因为他们的反叛和寻找是从争取个人幸福开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寻找充满了主观性。他们要寻找世界适合我，而不是我适合世界的道路。前者充分突出了自我的价值，以这种价值来选择世界，充满着咄咄逼人的创造性和反抗性；后者则要根据现实调整自我，以使自我去应顺世界。显然蒋家兄弟都选择了前者。蒋少祖要用主观的共和主义理想来改造现实，他希望站在众人最注目的地方，被崇拜和仰视着，自己如同洞察一切世间真理的古罗马哲学家，教导人们“从罪恶、偏见和无知中拯救人类。”蒋纯祖一开始就宣布：“我要拯救这个世界”。这个被拯救的世界就是要适合他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自我的绝对的扩张”，因为对于他来说，“假如他不存在，一切便也不存在”，金素痕同样如此。她的全部骚动，并不是不要蒋家；而是要蒋家适合于她的“和平图画”：“主妇的权威，老人的悠闲，丈夫的服从，家宅的整修、改建，财产的整理和花园的繁荣。”所以他们的寻找都紧紧地围绕“我”，突出“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小说中的这群蒋家儿女为何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只注意自己”的特点。

这种主观性必然要与客观外界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正是主人公们痛苦的重要根源。但另一方面，这种冲突内化在主人公们的精神世界中，就表现为理性和情感的尖锐对立。这是主人公们内心痛苦的又一根源。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所具有的冷静客观态度和严谨逻辑要求主人公们必须尊重客观，要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测定自我。但那闪烁不定、奔涌不息的情感更充满着青春力量和生命意识，它要不顾一切地扩张自己，淹没一切。因此对主人公们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在现实中，蒋少祖和蒋纯祖都崇尚理性，都想用理性精神来捕捉时代的真理。蒋少祖说，“我信仰理性”。蒋纯祖说，“我信仰人民”。他们的理论思考，比如蒋少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蒋纯祖对现代教条的反思，可以说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不管如何，他们都无法驾驭情感。蒋少祖始终不能泯灭他内心深处对金钱、权势的强烈情欲。他对王桂英的玩弄也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理性信仰的莫大讽刺。而蒋纯祖确实不知道他与人民“有怎样的联系”。他钟情于“美丽的情欲”，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任何社会的力量（政治的、道德的乃至艺术的）对他的约束。

如果把情感看作是萌芽状态的理性，理性是凝固化了的情感，那么在整个理性和情感的冲突中，决不是以一方取代另一方。因为两者对人来说都是合理的和必需的。问题是两者如何统一，个体的发展与整体的发展相一致，个人的自由满足理性的要

求。这确乎比简单地截取一方更艰难。小说让我们看到，在两者的冲突中，蒋少祖用理性抑制情感，最后变成理性人的最惨酷的心灵呻吟，而蒋纯祖则感受到更复杂的心灵痛苦。他既钟情于情感，又把这种情感看作是一种罪恶，并且向这种罪恶宣战。一天之内要经历到数次这种巨大的心灵搏斗：

“在早晨，他觉得生活美好，人的创造力无穷，中国的情况特殊，他必须信仰理性、道德，现实的方法，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到了晚上，他就怯懦起来，随后又勇敢起来，向他自己的虚伪……挑战了。”

蒋纯祖至死都没有停止这种搏斗。因此，蒋纯祖们的“寻找”变得更为艰难，他们既面临着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同时也纠结着个人与自我，情感与理性的矛盾。而对这些矛盾的克服和超越，构成了“寻找”的真正本质内容。我们看到小说中的蒋少祖寻找到了古代的文化，蒋蔚祖寻找到了父母的亡灵，金素痕寻找到了金钱，蒋秀菊寻找到了西方的文明和耶稣基督精神，而蒋纯祖寻找到了未来，这些寻找本质上都是对这一矛盾的个人方式的克服和超越。而这成为这部小说最主要的内容。而这种克服和超越，不管它展现的是心灵的道路还是现实的道路，是精神还是物质，都要直到使寻找者在自己的对象中真正体验到和谐和统一为止。因此，现代知识者从一个安宁和谐的家园被驱逐出来，最后达到一个新的安宁和谐，这两者之间确实是以流浪中的寻找来填补的。

3. 流浪的悲剧性归宿。

现代知识者既然选择了历史，那么他们最终也必然为历史的方向所选择。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群蒋家儿女大多从反抗传统精神开始，经过种种寻找，最后仍然回到了传统精神。出发点和归宿点重合，“寻找”所充满的强烈的反抗和现实的不和谐性，最终却被他们所创造的巨大的“和

谐奇观所销融。现代知识者在精神上走完一段艰难的路程，却忽然发觉仍然回到了出发点，这种精神上的圆圈运动使小说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象。

请看小说中的蒋少祖，他与父亲所代表的那个旧家庭决裂的时候，是抱着“要永远地反抗社会，要大胆地破坏这个世界的法律！”但很快地他就宣布：“对这个世界已经厌倦”，并且嘲笑自己过去的幼稚、盲目。他作出真诚的“忏悔”，他说，“现在我不受暴风雨的欺骗了！”要尊重社会的现存秩序。于是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个旧家族的浪子重又回到苏州故园温驯地搀扶着衰朽的父亲，父与子和解了，反抗者与传统和解了。蒋少祖成了蒋家实际的财产继承人。他的痛苦的心灵现在真正转向“平静和自由”。他所找到的“古代文化”，实在只是他的心灵的对象化而已，古代文化对于他，便是一个美满的人生意象，只有在这个意象中才使他获得“平静和自由”的心境。

蒋少祖在这群儿女中是有代表性的，例如蒋蔚祖、王桂英、金素痕等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都表现了这种“蒋少祖现象”。于是，这种精神的回归趋向使得过去那个对他们说来无法忍受的可怕的家庭，现在却变得如此亲密、神秘，以致使他们都情不自禁地叫唤：“回到苏州故园去！”疯狂中的蒋蔚祖在跌下悬崖、投江自尽前的最后一刻，体验到的是“我回家”的激动心情。留学欧洲的蒋秀菊所急迫的愿望是，回国后“我要第一眼看见我们的高贵的、快乐的家庭。”蒋淑珍别无他求，“我就想回苏州。”金素痕在攫取蒋家大宗财产后忽然奇怪地想到要“回苏州跟老头子和解。”与现代知识这种“回归”意向遥相呼应的是，封建财主蒋捷三——他们的父亲，那种恐怖而又神秘的呼唤，它把所有灵魂迷失了的儿女们召唤了回来，于是，小说中，蒋捷三抱着垂死的身子深夜在南京街头寻找儿子的一幕不是多余的安排，他那一声声凄厉的呼唤，对他所有的儿女都有着难以形容的震撼

尺。而在惨淡的街灯下，整个南京城仿佛都被这恐怖的声音笼罩着；在这个世界上，蒋捷三仍然“扮演着主角”，而在他的儿女们身上，本质上仍然涌动着他的混浊的血液。当然，现代知识者的回归现象还有着更为深刻和文化心理的原因，这里无力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现象与现代中国复杂和曲折的道路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已经有许多论者看到，从1840年以来，历代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知识者，大多具有反抗与和解，积极进取和妥协消沉的两面，他们的年青时代与晚年时代常常形成了极为悬殊的对立，几乎判若两人，例如林纾、严复、陈独秀等，而这种深刻的现象在《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中第一次被当作历史现象揭示出来。

但这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小说这样写道：

每一代的青年生长出来，都要在人们称为社会的那些墙壁和罗网中做一种强暴的奔突。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便顺从了。小的一部分，则因大的不幸和狂乱的感情而成为疯人。或由冷酷的意志而找到了自己所渴望的，成为被当代认为比疯人还要危险的激烈人物，散布在祖先们所建筑，子孙们所因袭的那些墙壁和罗网中，指望将来，追求光荣，营着阴暗的生活。

蒋纯祖正是这样的“激烈人物”。他选择反抗，就不再回归——“爹爹，从此永别了！”在江南旷野的流亡中，在工人朱谷良和匪兵石华贵那种善和恶、生与死的对峙中，他首先获取了“冷酷的自我意志”，在日后的演剧队和四川乡间的环境中，顽强地与那违反正常人性的现代教条和封建主义作猛烈地斗争。尽管他的肉体愈益羸弱，他的意志和热情却愈益坚强和健旺，这种勇猛的精神趋向，把他推向时代的实践的要求，以致最终他喊出了：“让我和那些慢慢地走着自己的大路的善良的人们一同前进吧！”

这样蒋少祖们和蒋纯祖们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问题的关键

是，他们实际所处的现实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与历史处在深刻对立中的社会。这种对立使现代知识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处境：尊重现实，就意味着丢弃历史；选择历史，就必须反抗现实。二者都必然地具有悲剧性。而蒋少祖们选择了现实，蒋纯祖们选择了历史。

三

上述分析了流浪的全过程。那么现代知识者在这一过程中究竟表现出怎样的精神特征？具有怎样的心态？胡风当年在给小说作序时说：“路翎所要的不是历史事变的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④这就是说，路翎并不仅仅满足对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流浪”这一苦难历程的揭示，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流浪中揭示他们的流浪精神，这主要的包括了他们的孤独感、忏悔感、疲乏感以及悲凉感。它们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⑤作为精神的主观体验，它们又伴随着主体走完流浪的全过程。

孤独感在现代中国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几乎所有写到知识者的现代文学作品（解放区文学除外）都涉及到这种精神现象。而对于这群处在精神流浪中的“财主底儿女们”，其体验尤为深切，正如蒋少祖所感到的，每个人都象汪洋中的一个岛屿，彼此孤立，没有两个人是相互沟通、和谐共处的。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孤独感来自于文化心理上的孤独感。当现代知识者从强大的历史传统中摆脱出来，踏上精神流浪之途，“一切都离开了我”，他们没有了任何依傍，历史第一次让他们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来开辟未来的道路。因此，孤独就成为他们在审视历史和现实，个体与群体中的主要的精神体验。小说中多次写到的旷野的

意象和黑夜中火焰的意象都深刻地揭示了他们这一精神特征。面对现实，主人公们如同置身在茫茫的旷野中，如同被弥天的黑夜包裹着的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得不到任何呼应和援助，有着随时被淹没和吞噬的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孤独感也给主人公们一种个体挣脱了群体的束缚后的自由和解放的欢愉，以及对群体的麻木不觉悟状态的悲哀。“众人皆醉，唯我独醒”，醒后的孤独感既是对自我的激赏，又是对众人的悲哀。不管如何，它表现着主人公的一种主体意识的张扬。因此主人公们对孤独一方面是痛苦的呻吟，另一方面又是热烈的地礼赞。“旷野”既是那样使人恐惧，同时又是那样亲切。每当遇到现实的挫折，这些骚动的灵魂便总是叫道：“让我到旷野去！”同样，面对黑夜中的火焰，蒋纯祖和蒋蔚祖都体验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欢畅。可以说，这些都在潜意识中表现着主人公们对孤独的真正态度。但是，孤独毕竟不是独立。“独立不倚他”，是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前行目标为基础的，而这两者对于现代知识者来说还有待在“寻找”中建立，因此，他们的这种孤独恰恰是一种不能独立的心理体验。这一方面由此激起了主人公们对独立的强烈渴望，并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在流浪中经受颠沛；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主体来说，他无法长期地忍受孤独带来的心理失重。于是，对群体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日益成为一种潜意识，迫使他们更明确地去寻找“群体”，寻找精神的支柱。因此，孤独感也就不得不成为精神流浪中的有机部分。

忏悔感并不如人们所说的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负罪感。这只是忏悔感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表现为自我谴责的强烈需要，以此来获得精神的解脱。这种谴责有时可以发展到毁灭和毁身的地步。因此只有负罪感和自我谴责结合起来才构成忏悔感。

对于现代知识者来说，孤独感与忏悔感是连在一起的。当他们在孤立无援、寂寞苦闷中，他们的所有心灵独白都转化为一种向正在寻找的目标的忏悔。这种忏悔不仅慰藉了孤独的痛苦，而且更重要的是坚定了他们对既定目标的追求，使他们排除一切感情上和理智上的障碍，毫无顾忌地趋向目标。但是，每个人的寻找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构成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忏悔内容和忏悔性质。

蒋少祖向着他寻找的古代文化忏悔。这个古代文化被想象成一个绝对宁静、自由、充满牧歌气息的伊甸园，是一个神圣不可企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面前，他过去的一切显然都是混乱、盲从、无知的，是受了“西方自由主义、颓废主义”的影响。他用这个“世界”来谴责自己对各种情欲的骚动。很显然，这个古代文化是被蒋少祖充分主观化了的，仅仅是蒋少祖的“自身的假象”，是他在现实中无路可走时的一种简单的逃避和自欺。在这里，古代文化对于他变成了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与现实的人对立起来，不是人决定了它，而是它决定人、限制人，人的价值只有在它那里才能得到确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蒋少祖把向古代文化的趋附当作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唯一的目标。因此蒋少祖的忏悔成为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⑥带有宗教的倾向。

如果说蒋少祖的忏悔向着过去，那么蒋纯祖完全是向着未来，向着健全的人性。每当他发现自身心灵深处与健全人性格格不入的丑恶，便使他产生强烈的自责。

“为什么我这样肯定，这样自私，这样夸张？没有用，我永远如此！必须痛苦鞭打，从鼻子上流血，不要丝毫慰藉，直到死去……常常企图安慰自己是可耻的！必须记着你的可耻的过去，必须记着你刚才的堕落和卑怯！最好是完全制尽，痛苦到死，连忏悔的安慰也不要，因为你明天还要堕落，这样到达你的最大的